

核心阅读

混合战争，简言之就是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

随着指向大国周边的混合战争越来越成为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的手段，对于大国而言，维护周边安全的挑战将

面临新的考验。

战争如此频繁，以至于有人认为，一部世界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就战争形态而言，今天的民族国家正面临着三种战争形态的威胁：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小规模非正规战争和由这两者整合出来的混合战争。混合战争，简言之就是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战争形态。混合战争的出现改变了战争原来的面貌，以至于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它的时候，就已悄然而至。它对国家安全所带来的挑战既是隐性的，也是现实的。

混合战争：从传统战争中整合出的新型战争形态

混合战争理论源自美国军事学界，经历了一个由混合威胁到混合战争的蜕变过程。2005年版的《美国国防战略》最先提出混合威胁的思想：未来最有实力的对手可能会将破坏性能力与传统、非常规和灾难性作战样式结合使用。2007年由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海洋安全协作战略》首次把混合威胁视为现代战争的特点，并提出：通过

创造性地运用低端和高端技术，非国家行为体、常规和非常规战术以及分散性计划和实施三者交织混合正日益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特点。同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校弗兰克·霍夫曼撰写《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一书，首次系统性探讨了混合战争理论。霍夫曼认为，在过去，常规作战和非常规作战虽然在战略上是协同的，但在战役和战术层面无法实现协同。但最近的一些战争案例表明，这种协同是完全可以的，过去将战争区分为“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的两分法已经无法抓住未来战争的精髓。未来美军将要面对的是一种混合型的战争样式，需打赢一种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相混合的混合战争。

相比美国，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的研究迟至2013年才开始开展，但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2013年2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发表文章认为，战争的界限变得模糊，确定战争状态愈加困难，常规军事手段需要政治、经济、信息、人道主义及其他非军事手段的支持。2015年，格拉西莫夫在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工作总结会议上专门作了题为《“混合战争”需要高科技武器和科学论证》的报告，首次系统阐述了俄军对混合战争的理解。他认为，在现代冲突中，斗争所使用方法的重心越来越向综合使用政治、经济、信息及其他非军事措施方向转移。实施混合战争所使用的间接与非对称方法能够在不占领对抗方领土的情况下剥夺其实际控制权。正是格氏对混合战争理论的开创性探讨，俄罗斯的混合战争模式也被冠之以“格拉西莫夫主义”的称谓。

综合美俄对混合战争理论的研究，混合战争有五个特征：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个人等战争主体的混

合；常规作战、非常规作战、恐怖袭击、犯罪骚乱等战争样式的混合；作战、维稳、安全、重建等军事行动的混合；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信息等战争手段的混合；击败敌军和争取民众等多种作战目标的混合。这些特征也反映出混合战争相比传统战争的“六个变化”：一是战争的制胜机理在变。传统战争以攻城略地，通过对敌人实施摧毁达成战争目的；混合战争则重在改变观念、争夺人心，通过对敌人实施软杀伤来达成战争目的。二是战争主体在变。传统战争是国家、民族、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而混合战争的参与主体日趋多元，既包括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还可以是两者的混合。三是战争界限在变。混合战争打破了传统战争和平与战争的界限，往往是不宣而战，同时在战争爆发前有数年乃至数十年的酝酿期。四是战争空间在变。混合战争极大扩展了战争空间，将对抗领域由传统的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拓展至社会心理层面，实现了“物理域、信息域和人领域”三者的融合。五是战争力量结构在变。在混合战争中，信息战力量、特种作战力量、心理战力量和准军事战力量开始由辅助手段上升为主战力量。六是作战行动在变。除传统作战行动外，混合战争更强调运用外交战、经济战、网络战、心理战、舆论战等作战行动，集中体现为信息和智力的对抗。尽管有如此多的变化，但混合战争并没有改变战争固有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和暴力属性。

混合战争出现的原因

混合战争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一是全

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影响。人口、资源、信息的跨国界流动日益频繁，使得国家和政治精英阶层对民众价值观念的灌输、引导和控制大为减弱，普通民众的价值理念日趋多元，社会不再表现为一个统一完整的理念板块，这构成了混合战争出现的心理条件。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为混合战争的进行提供了大量可资操纵利用的手段和力量资源，战争主体的多元性由此而来。全球化深入发展还带来先进技术的扩散，技术的易得性扩大了战争主体发动混合战争的能力。

二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在社会信息化时代，连结民众不仅仅是族群、血缘、文化等传统因素，还有信息、心理、价值观念等全新元素。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便于这些全新元素的传播，为“网络战”的实施供给了强大组织手段，同时也为混合战争大量实施精神和心理攻击提供了网络手段。

三是现行国际规范对传统战争的强制约。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对国家发动传统战争的权力作出了严格限制，但对混合战争这种隐秘的、新出现的战争形态的制约较弱。这样一来，传统战争和混合战争在国际规则规制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约束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混合战争的产生。

四是对传统战争模式的反思。美国之所以提出混合战争理论，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对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反思。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国赢得了战场，却输掉了战争。战争不仅大幅削弱了美国的力量，尤其是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大为受挫，更让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甚嚣尘上。这让美国意识到，争取人心而非攻城略地才

是赢得胜利的根本。一个间接的原因是对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为期34天战斗的研究。这场战斗，以方约有120名军人死亡、40余名平民死亡，被击毁、击伤“梅卡瓦”坦克18辆；真主党方面约有500名军人死亡，近1200名平民死亡。尽管伤亡远低于对方，但它表明此前被主要发达国家军队奉为圭臬的“科索沃”行动模式的失败，即，凭借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和高科技武器，通过典型的非接触作战，仅靠大规模突袭作战就能达成战争目的，而且优势一方可接近实现战场零伤亡。可以说，美国提出混合战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一贯推崇的“技术决定”的校正和反思。俄罗斯则从“颜色革命”、科索沃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研究中找到了混合战争的灵感。

混合战争带给国家安全的新挑战

混合战争的兴起有可能使得核威慑平衡与经济相互依赖下的大国间的战争行为变为现实。作为一种战争形态，混合战争并不是一种大规模的战争，其目的也不在于攻城破国而是争取人心，在于制造一种“可控的混乱”。与此同时，它针对的并不是大国本身而是大国的传统地缘政治范围和周边地区，恶化大国的周边环境却又不与大国直接对抗。混合战争的间接性、长期性和非正面对抗性，使得它很难被认为是国家行为，这就意味着核武器并不能保障国家免除战争的威胁，至少大国间发生混合战争的可能是存在的。

混合战争因为非对称和非暴力手段的使用而大大降低了战争的成本，战争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混合战争

核心打的是信息战和智力战，高度依赖网络、舆论、外交、心理、人文等非暴力手段。这样一来，战场的硬投入其实是下降的，对发动混合战争国家的经济要求并不高，但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酝酿时间，以待战争的对象国内部出现有利于己的变化。其结果是，混合战争的时间成本要超过经济成本。这对于经济不太景气的国家而言，依然算得上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战争机理上讲，混合战争也注重对“低端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和对“非国家行为体、常规和非常规战术以及分散性计划和实施三者交织混合”，这些做法虽然追求的是战场效果的最大化，但在客观上也降低了国家发动战争的经济成本，战争也将由此而变得廉价。同时，混合战争本质上是一场有限战争，其目的也是制造一种可控的混乱或者说是一场可控的危机，为未来目的的达成塑造一种有利的态势。有限自然也就意味着成本的可控。

混合战争对国家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提出了新挑战。混合战争依赖军事手段、信息手段、网络手段、舆论手段和外交手段等诸多手段的协调配合以产生最大的战场效果，更离不开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和国防指挥体制的高效运行。这说明国家力量强大固然重要，但整体力量结构是否合理，同时能否集中、迅速、有效地使用已有的力量并打出组合拳则更为关键。否则即使拥有强大的力量，可能依然不能适应和胜任混合战争，一样会在战场上摔大跟头。

当然，随着指向大国周边的混合战争越来越成为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的手段，对于大国而言，维护周边安全的挑战将面临新的考验，这也对国家应对国际重大危机和塑造地缘政治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的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把握中非产能合作的重点难点

□ 王晓红

非洲大陆的“群体性”崛起是本世纪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将进一步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平衡发展。非洲是我国未来最具潜力的市场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重要区域，我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日益深化，实现了互利共赢。不断深化走进非洲战略、扩大产能合作，一方面有利于拓展新兴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中非贸易平衡，对于践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理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投资环境来看，非洲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进程明显加快，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且中非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使这些国家认同感较强。从产业结构来看，非洲正处于工业化和信息化初期，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都存在旺盛需求，与我国产能合作高度契合，尤其是对制造业领域的强大需求为国内过剩产能转移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非洲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成本优势明显，为我国在矿能资源及服务业、农业等领域的投资合作提供了市场机遇，因此将成为我国未来理想的投资目的地。

非洲多数国家处于欠发达国家水平，应把防范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以下风险尤其值得关注。一是金融风险。主要是由于汇率大幅波动导致企业损失。二是安全风险。一些地区社会秩序混乱，抢劫案、绑架案多发。三是政治社会动荡风险。东道国的政权更迭导致的政策多变和不确定性较突出，宗教势力引发的社会动乱较频繁，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办事手续繁琐、周期较长，官员腐败较严重、劳工纠纷较多等营商环境问题也比较突出。四是疾病风险。

非洲国家多数处于热带地区，距离赤道近，是疟疾、黄热病、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高发地区。此外，基础设施条件差、物流成本高、工人素质相对较低、工作签证时限短等问题也都对投资企业产生影响。

总体来看，我国在走进非洲战略上还没有形成有机协调的整体合力，目前企业投资的组织性和协同性不够，基本处于“一盘散沙”、单打独斗的状态。融资难问题突出，据中资企业反映，非洲当地银行融资成本普遍很高。医院、教育等配套服务不完善，由于非洲当地医疗条件落后，欧美及土耳其、印度等国家在非洲一些地方都设有医院，但很少有中国医院，中资企业员工要在外国医院看病，费用较高。在教育方面，比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设立至今没有一所中国学校，子女上学都要送到开罗市内的国际学校就读，我国对埃及援建的国际学校均未落入园区。未来园区将有3000名左右的中国员工，教育、就医、培训将成为影响园区发展的三大瓶颈。

随着非洲逐步成为世界重要的投资目的地，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及印度、土耳其等国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加强走进非洲战略顶层设计和统筹布局，对于不断稳固扩大非洲市场十分重要。

加强统筹性和协同性。在宏观层面，要统筹好援外与对外投资的关系。应考虑在我国对非投资总体战略布局的框架下，有针对性地用好援外资金和项目，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对非投资。在金融层面，要不断扩大与非洲相关国家建立货币互换制度，扩大使用人民币结算范围，有效对冲投资国因货币贬值带来的金融风险；鼓励四大商业银行、国开

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非设立离岸机构，不断完善海外金融网络，为境外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在产业层面，要加强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投资协同并进，制造业转移与服务配套跟进，有步骤地推进产能合作。在企业层面，要加强组织性，形成国企带民企、大企业带小企业共同走出去的格局。

加快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在中资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不断完善医院、学校、金融网点及其他生活配套设施，注重将援助项目与为中资企业服务相结合。尤其应加强海外安保力量支持。随着我国对非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有效应对当地发生的恶性案件、保护境外企业财产和人员安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要发展壮大中国安保公司规模，降低境外投资企业使用安保服务成本，鼓励为在非的中小企业提供更优惠的安保服务。

建立企业对外投资资格审查制度。由于目前对走出去的企业缺乏必要的资质审查，导致企业素质参差不齐，屡屡出现一些为了盈利缺乏社会责任，破坏当地生态环境、违反投资规则等问题，给我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为此，应建立对外投资企业资质审查制度，完善评价体系，选择符合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

加强境外经贸园区建设。境外经贸园区是我国境外企业聚集发展的重要公共服务平台，应落实好相关政策，加强园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双边政府机制作用，帮助园区企业协调解决困难。



处使，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三是始终感恩组织。珍惜组织给予的政治生命，感激组织带来的荣誉感、归属感。坚持感恩、听党话、跟党走，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兴党，努力把爱党之情转化为为民谋利的公仆情怀，把忧党之心转化为为党增辉的实际行动，把兴党之责转化为群众赞誉的工作业绩。

（作者系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

（上接1版头条）大连要加快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着力打造我国北方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融会贯通、统筹推进，加快构建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县域经济关键是立足县情、依托禀赋，找准比较优势、夯实产业基础，坚持把发展“飞地经济”作为重要载体，打破项目落地瓶颈，实现要素集约、资源集成、产业集聚。

积极推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我们要大力发展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新能源等接续替代产业，深入推进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做好阜新海州矿、抚顺西露天矿等特大矿坑综合治理。要完善道路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保障好困难群众生产生活。

牢牢抓住绿色发展这个支撑点，打造生态文明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振兴东北的一个优势，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更好支持生态建设和粮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我们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生产、生活、生态绿色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辽宁。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和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实施好蓝天、碧水、青山、净土、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五大工程，持续巩固蓝天保卫战成果，全力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攻坚战，特别是要打好治水攻坚战，把治水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突出抓好辽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全力加以推进。

着力打造北方生态屏障。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治理，深入推进辽西北沙化和荒漠化土地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开展“五矿共治”专项行动，着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大力发展美丽经济，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绿色化改造，努力使产业结构变“轻”、经济形态变“绿”、发展质量变“优”。

全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为粮食主产省，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永久基本农田数量和质量只增不减，大力实施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工程，减少玉米种植，稳定水稻、花生种植，增加设施蔬菜、名优水果产量。壮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提升农业规模经营。坚定不移推进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培育一批叫得响、信得过的绿色食品品牌，真正实现由大粮仓向绿色粮仓、绿色菜园、绿色厨房转变。

牢牢抓住扩大开放这个突破点，构筑开放合作新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东北开放是篇大文章，面对全国开放大棋局，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大环境，需要以战略眼光、全球视野来谋划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我们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坚持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新时代全面开放的总抓手，以高水平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以全面开放引领全面振兴。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加快创建中国—中东欧“16+1”经贸合作示范区，办好2019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议，深化与中东欧16国的合作。高标准建设“引进来”集聚发展区，抱团式开拓“走出去”境外产业园，打造体制活、功能全、聚集强的双向投资高地。

建好用好重大开放平台。发挥好自贸区改革创新“试验田”作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自贸区与重点产业园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

发展。办好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沈阳制博会等，打造国际化高层次对外合作交流和投资贸易平台。深入开展“招商引智、招才引智”，对准靶心、精准招商，让内资外资、国企民企都来投资兴业。

主动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主动承接京津冀冀高端产业转移、科技创新要素辐射。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着力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加强功能区对接、园区共建等领域合作。加强与京沪苏对口合作，加快复制一批改革创新举措。完善东北区域合作机制，形成协同开放合力。

牢牢抓住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落脚点，共享全面振兴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关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让人民群众共享东北振兴成果。我们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振兴为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努力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强保障兜底线。编密织牢民生兜底保障网、安全网，保障好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扩供给广覆盖。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促进普通高中优质化、多样化发展，加快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深入推进健康辽宁建设，完善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推进文化共享工程、惠民工程，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稳就业增收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和基层成长计划，引导高校毕业生留辽来辽就业创业。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援助，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和各类群体收入增长三年行动计划，确保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让人民群众共享振兴发展成果。